



# 帶著鳳梨酥去見咖哩香腸<sup>1</sup> —離開舒適圈的留學記事

孫聖昕

## 單打獨鬥的冒險

Wie Bitte? 是我在所有德語中 fastest 學會的兩個單字（同義於Excuse me）。雖然已經先在大學語言中心上過一些初級德語，但當我遇上真正的柏林腔德語或是一般正常的語速時，仍舊像是在看一部沒有字幕的電影，而我或許就是電影裡面的主角楚門<sup>2</sup>。一方面來說，我每天都有收集到陌生人好奇或是疑問的眼神，讓我

隨時都能意識到自己是個「外國人」。另一方面，柏林其實又不是那麼「德國」。就像1963年甘乃迪總統在柏林圍牆前說出一句：「我是個柏林人」（Ich bin ein Berliner）<sup>3</sup>，這座城市在二戰後吸納了許多移民人口，如此地歡迎從世界各地而來的築夢者。作為德國文化中的「他者」（Others），如何融入這座性感之都<sup>4</sup>，就像是一場有趣的實驗。

1 咖哩香腸為柏林著名食物

2 電影：楚門的世界

3 甘迺迪

4 柏林市長：Berlin is poor, but sexy!— Klaus Wowereit, Former Berlin mayor, 2004

2016後半年，我離開自己長久以來所習慣的舒適感，這同時意味著要重新建立新的生活圈，讓自己無論在生理或是心靈上都能找到一個安置自己的支點。為此，我作了很多準備與嘗試。

提升語言能力，自然是留學德國要面對的第一項挑戰。雖然在語言學校已經學了一大把的單字、文法與句型，實際使用第二外語，仍是一件需要勇氣的事。在某次偶然的機會，朋友介紹我「沉浸式習得」的概念，鼓勵我們要像一個小孩子一樣學習語言，這讓我明白「創造環境」的重要性。市面上有各式各樣的App軟體，如Tandem、Preply等，提供一對一的線上家教或語言交換的機會，讓我能認識世界各地的朋友。除了與德文母語者練習口說，還能找到一些同樣在學習第二外語的學伴，在語言學習的道路上相互支持。

那麼，工具都磨利了，東風到底在哪裡？已經找到可以對話的人了，我到底要講什麼？

「每一年我都可以知道我的亞洲學生最近在流行吃些什麼。」我在語言學校的老師，曾經說道。

「飲食」，真的可以稱為是所有話題的首要選擇。其實聊吃，是一種與陌生人拉近距離的方式，同時它也可以做為一項媒介，用以探究不同文化中所蘊含的生活哲理。「為什麼鳳梨酥可以代表臺灣？」、「為什麼你們要因為粽子爭吵？」，有時候我會遇到這些問題，讓我開始重新思考臺灣文化中的事物。更具體地說，我必須要內建一套隨時能介紹給朋友、滿足好奇心的答案集。撇除語言的因素，我原本以為講述關於臺灣的一切，是一件簡單的事，實則不然。在異地談論臺灣，就好比向他人介紹一位與自己共同生活很久的友人一樣，看似很親近，但卻因為沒有從多種的角度觀察，而變得有些疏離。「我要怎麼介紹臺灣？」這個問題透過食物的話題、節慶相關的話題還有各式政治政策與社會經濟的討論，頻頻向我拋出一個個大問號。每每語塞之時，總會讓我想要更了解我所生長的家鄉，到底在這個地球村中，到底長成什麼樣子。我想，這就好比一項留學生在留學期間一定會接觸到的專題研究。



當柏林人很簡單！（開個德國儲蓄銀行的戶頭就可以）。



柏林影展的標誌—柏林熊（攝於2018）。

### 一群人的實驗—柏林臺灣電影節

幸好，我找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他們邀請下，我在2018年加入了Impression X Taiwan柏林臺灣電影節的志工團隊，致力於用臺灣電影作為媒介，向柏林展現臺灣的作品。當時，柏林因接收敘利亞內戰的難民潮而產生的排外情緒已經漸趨和緩，我們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嘗試籌辦第一次影展。不意外地，這個遙遠的亞洲小島只引起一些德國朋友的注意，並未引發太多的討論與關注。儘管如此，影展已經成為一種向他人介紹「我是誰？」以及「我來自哪裡」最直觀的一種方式。

「對話(conversation)」從來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臺灣海島民族的開闊性格、殖民的歷史背景、多樣族群的組成，讓我們接納不同的文化、不同群體、傾聽不同的觀點，在無止境的對話中，不斷包容、吸收、蛻變並孕育為臺灣底蘊。

這是在籌備2019年影展時，所放在flyingV群眾募資的文案上的一段話。我認為這段話讓柏林與臺灣找到了一個連結點。柏林之所以為柏林，就是因為它允許這些對話與碰撞的存在，每兩三天就有一個小抗議、每一兩週就會有個需要出動警力維持治安與



跨文化活動中心Interkulturelles Haus in Schöneberg。

封路的小遊行；而臺灣之所以為臺灣，則是因為它藉由近幾年看似不平靜的碰撞如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死刑存廢、多元成家等不同的議題，逐漸共構出屬於自己的特色。藉由籌備影展的機會，臺灣於我的印象再也不僅僅只是躺在地圖上的一顆番薯，而是越來越有立體感、擁有鮮活形象的亞洲之心<sup>5</sup>。同時，當我面對「我從哪裡來？」的命題時，越能駕輕就熟。

### Famos Connect Program 與文化交流工作坊

回顧2018年冬季學期，我再次擁有了學生的身分。除了因為影展而認識的臺灣好友外，我從洪堡大學（Humboldt- Universität zu Berlin）的Famos Connect Program中得到了來自德國在地人的支持與協助。這一項由國際事務處提供的特別針對外籍生的共學計畫，類似於成功大學所提供的Buddy-Buddy

Program，每位外籍生會得到至少一位同系所或是同學院的學長姊的修課建議或是他們所分享的學習經驗，讓我們做好學習的準備，面對各種新學期挑戰，免於成為一隻隻無頭蒼蠅，獨自面對不熟悉的選課系統、作業形式，或是在迷宮般的主建築中找不到教室。另外，計畫也會定期安排一些走訪柏林、認識柏林歷史的活動，讓我們在課餘時間也能更深入地探索城市，了解自己所生活的地方。這些實用的建議與協助，豐富了我留學的第一個學期，著實撫平了不少內心的不安。

在這一處所有外籍學生都能相互交流的地方，文化衝突與歧視自然是一個很重要的主題。在德國這個民主國家中，仍然有極右派德國另類選擇黨（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AfD）和新納粹主義（Neonazismus）存在，這些極端右翼的思維，可能

5 觀光局The Heart of Asia



郵筒及牆面隨處可見的塗鴉。

含有民粹主義、主張排外並反對移民與伊斯蘭，不僅歐洲人會開始擔心，這些思潮可能會對他們好不容易在1991年重新統合起來的國家，與其所堅持的民主與自由的價值造成不良的影響，甚至重演二戰前所犯的錯誤－民選出希特勒作為德國總理。

雖然說，比起德國部分右派保守勢力較多的城市，柏林並非那麼排外，但相關的事件或是意外仍然會發生，所以學校特別在給外籍生的新生訓練系列活動(Check-In Woche)中，舉辦了一個與歧視有關的主題工作坊。也許是因為我當時對「歧視」的敏感度不算很高，我並未覺得自己待在歐洲的這幾年有遭受到什麼不當的對待，有時甚至會遇到一些年長者逕直地朝我走來，請我幫他指路。一般亞洲留學生最常遇到的狀況，不外乎就是被人直接以「亞洲人」或是「華人」的框架套住，有時對著你大喊「Go back to China!」、「ni hao」或是

「konichiwa」也有時會問你到底吃不吃狗肉。和我相比，一些穿戴面紗Hijab的伊斯蘭同學，或是擁有黑髮的非歐盟同學並沒有那麼幸運，有時甚至會演變成嚴重的肢體衝突。

面對歧視問題，我們提出了我們的解決方案：噤止、溝通與教育是三個最有效的管道。此外，如何辨識出生活中的歧視問題，練習尋求幫助，則是我們課後要做的實踐作業。這次工作坊雖然只有短短的一個半小時，但我從這裡學習到的概念與工具，卻為我打下日後化理念為行動的良好基礎。居住在圍牆倒下後的柏林，歧視已然在我的生活中佔據了核心的位置，成為一項我時常關注的議題。

### 歧視與偏見

自2020年3月中旬，德國總理梅克爾發表了針對Covid-19的全國性演說，呼籲全國應該要團結



2017年勞工音樂節（反對資本主義）。

（Solidarität），共同抵抗新型的疾病。此前，許多亞洲留學生可能早已因為在路上配戴口罩<sup>6</sup>而被投以異樣的眼光，或是被嘲諷。臺灣在德相關組織，也分別創設了鄰里互助組織，行動標語或是相關產品。更甚之，有些德國人也會作勢要咳嗽，只為了觀察亞洲人的反應。尤其，「Ching Chang Chong!」，這三個由模仿中文發音而來，用以貶低亞洲人得的音節，更是在這半年內漫天飛舞。

「老實說，這些經驗會讓我對德國人還有民主體制很失望。」一位曾經在S-Bahn<sup>7</sup>上與德國人大吵的友人，這麼跟我說道。

的確，歧視與偏見是群體共構出來的一套分類標準，除了種族、膚色以外，性別、語言也是分類的面向之一。儘管我們現在已經能夠理解這些「歧視」言行背後的邏輯，但當下面對這些惡意又充滿

<sup>7</sup> 德國大眾運輸工具的一種 Strassen Bahn

<sup>6</sup> 在德國，只有重病、帶有傳染病或是虛弱的人，才會配戴口罩

地獄梗的嬉笑嘲弄，有時仍然會讓人氣得發抖。席捲而來的無力感，更是會拖住我們的腳步，使我們感到猶豫，難以找到合適的自處方式。

前些日子，雖然步調緩慢，德國政府大約在六月底已經逐漸宣布解封，整座城市已然迎接2016年以來最舒服的夏日。同時，德國政府也正式地規定民眾要在進入較為密閉的空間前，如：捷運、超市、餐廳等，佩戴口罩。並且，人與人之間也應該保持兩公尺以上的社交距離（Social Distancing）。

現在，我有時仍會從一些小朋友的口中聽到China、Asia或是那鏗鏘有力的三個音節<sup>8</sup>，但當我注意到時，他們早就已經嘻嘻笑地跑開了。

每次遇到歧視時，我總會連結到我人生中每一個「重新啟動」時刻：第一次步入大學校園的門口、走進自己的宿舍，還有剛踏出柏林Tegel機場，正式啟動我的留歐生活的時候。那時，我帶著對新生活的憧憬與期盼進入新的環境，也帶著一些莫名的擔憂，留著讓自己隨時能在情況最壞的時候，選擇逃離。但我的心境卻也因為在歐洲渡過了這次嚴重的全球疫情危機，而有些改變。

病毒有可能造成了恐慌感，或是增加了各個群體之間相互防備的頻率，但同時也迫使人們維持一個緊密相連的網絡。有些人可能透過激烈的舉牌抗議，也有些人用網路平台和平地提出訴求，在如此喧擾的2020年，我從一個不喜歡接觸陌生環境的外國人，變成一位暫居柏林的移居者，我有時看著柏林



德國Clash酒吧，反對歧視及法西斯主義的標語。



牆面塗鴉——婦女解放。

<sup>8</sup> Ching, Chang, Chong!

人很難笑的笑話捧腹大笑，也有時能在遇到別人的言語騷擾時，能用德語奉還致命的一擊。

有位友人曾經與我一同討論「出走」的意義。她說道：「有些人在出走前就已經認識了自己、了解自己的侷限，同時有自己的理想，知道自己在追求什麼；但也有一些人，是走出了以後才知道自己長什麼樣子。」我想，這段話對於任何離家求學或是進入新領域的人來說，都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提醒。從臺灣出走後，才發現作為一個外國人，要在異地生活是一件多麼令人感到孤單的事。



combuy疫情措施。



Dm疫情措施。



柏林電視塔一景。

## 結語

留學對我而言，是一段讓想像破滅後，又再次重構的過程。其實，離開自己的城市到它方求學（如臺北到臺南、高雄到臺北）又何嘗不是如此，感到自己像是個異類呢？近年來，到臺南定居的外國人或是在成大就讀的外籍生越來越多，他們是否也會有類似的感受？如果你就是其中一員，你又會怎麼做呢？